

A Cultural Reflection on the Traitor Phenomenon in Recent China und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Xie Yan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traitors called as “Hanjian”, as an ordinary and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y threaten the social morality and stability in aspects varying from thoughts, speeches to actions. At present,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the western public opinion smear and the western mainstream culture’s malicious attack, and there are statements and actions that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in virtual network, the reality and even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this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is paper is aimed to find out the origin, reasons and influence of the Han Jian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times, and take a page from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atriotism education culturall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Hanjian phenomenon; College patriotism education

Received: 2020-06-01 ; Accepted: 2020-06-09 ; Published: 2020-06-15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近现代“汉奸”现象的文化思考

谢 琰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

邮箱: xy.choice@foxmail.com

摘 要: 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中，“汉奸”作为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群体，在各类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思想、言论到行为，“汉奸”都影响着社会舆论，威胁着社会稳定。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面临西方舆论的抹黑及西方主流文化的恶意攻击，在虚拟网络、现实生活，甚至教育活动中都存在着以疫情影响为借口，危及国家安全的言论和行为，对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疫情期间，本文从近现代及当代“汉奸”现象入手，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影响，借鉴西方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从文化根源推动当代中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汉奸”现象；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收稿日期：2020-06-01；录用日期：2020-06-09；发表日期：2020-06-15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召忠将军曾发问：“为什么我们民族的汉奸层出不穷？”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先生也多次就社科院的院士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提出警示，并指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联盟，而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阵地。”^[1]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舆论层出不穷，国内负面发声屡禁不止。当“汉奸”不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与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相结合形成新的“汉奸现象”时，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的产物。

1 “汉奸现象”相关概念界定

1.1 汉奸

“汉奸”起源于封建时期，最早可追溯至汉朝，原指汉朝对外战争中背叛汉朝之人。在民族大融合时期，以魏晋南北朝、宋金辽时期为代表，指代背叛汉族的人，即汉民族的败类。至明朝时期，“汉奸”有两种类别：一是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指）战争中背叛汉族和大明朝庭的人；二是明朝沿海抗倭等反侵略战争中背叛汉族利益的人。自清朝晚期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内部矛盾弱化为次要矛盾。辛亥革命后，现代化民主国家建立，中华民族取代汉族成为对外斗争中的主要称谓。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汉奸”转变为背叛中华民族，背叛中国，出卖国家利益的败类。要指出的是战争中的投降军队、殖民下的顺民、高层中的主和派并没有划分在“汉奸”队伍中。自此，“汉奸”概念不再仅仅是就民族而言，国家概念也被引入。这个概念也逐渐被广泛认同。

1.2 民族

在“汉奸”概念中，民族一直是中心词汇。由原始的汉族到中华民族，这其中蕴含着民族概念的转变。民族原指拥有血缘关系，有着共同文化、回忆、

语言文字和强烈的身份认同的群体。汉族起源于华夏族，后经过民族融合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汉族[3]。由于血缘、文化、信仰、语言、文字等的共同性带来的是民族内部的高度团结与统一，因此背弃民族信仰、出卖民族利益就成为违背民族公约和民族道德的行为。在民族概念中的“汉奸”更多的是道德的审判。当然，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满、蒙、疆、藏等多民族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美利坚民族等情况相似[4]。这与传统民族概念是不同的。中华民族包含着不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高度统一与认可。我国由于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阶段，不同民族之间有着较统一的政治认同和深度的文化融合，因此在面对外来侵略时，不同民族间的纷争便成为了次要矛盾。经过长期的合作和对外抗争，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

1.3 国家

从常规角度来看，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领土、政府、历史等因素的共同体可以称之为国家。现代意义的“汉奸”概念中，强调对国家的背叛，民族的概念被弱化。这其中既包含了现代社会中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包含公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个人认同[5]。国家概念中的“汉奸”主要指向违背社会契约、违反国家法律的意识行为。国家概念的强势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就是从个体、氏族、部落、民族再到国家的社会化演变。民族和国家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笔者认为民族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汉奸”从民族概念转变为国家概念也预示着现代社会从道德制约为主转化为法律制约为主。

1.4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民族独立运动，指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也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国家形式，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与国家不同，民族国家中更多的体现出民族与国家的互动性。也就是通过单一民族或多民族成立国家，通过国家政策推动民族发展。在文化范围，民族国家功不可没。有一种说法称：“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于通过国

家政策制造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6] 我们的中华民族正是经历了无数的王朝而最终形成的,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也是在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才建立的。结合上述对民族和国家的论述也就可以看出,我们当前的国家概念主要是民族国家概念,其中包含着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信息。

1.5 当代“汉奸现象”

“汉奸”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是卖国者的代名词,其核心就是出卖国家利益,危及国家安全。那么“汉奸现象”就可界定为:以出卖国家利益,危机国家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社会意识、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7]。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8]。其中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是核心,文化安全既是关键又是保障。对应当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内信息传播环境及世界疫情与舆论局势,所谓“汉奸现象”的具体表现就是:打着新冠肺炎疫情招牌,叫嚣地区独立或引起我国领土纷争等;宣扬中国泄露、中国污染、中国威胁、污蔑中国人权等;扰乱经济秩序,唱衰中国经济等;抹黑中国政治,言论支持“割地赔款”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荒谬主张,干扰我国正常外交及政治职能等;泄露国家机密,引起社会恐慌,刻意散播疫情相关虚假消息等;破坏生态生活环境,干扰正常社会治理等;虚无中国历史、抹黑中国历史等。这些行为指的是行为人蓄意为之,以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其遮羞布,以出卖、损害国家利益为出发动机,日常生活中无意为之不在其列。

2 近现代“汉奸现象”的特点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虽然这种当代的国内“汉奸现象”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较为频繁出现,但现代概念上的“汉奸”盛行是从清朝的中晚期开始的。现代意义上的“汉奸”作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个例出现,大抵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从国门被近代侵略者打开,从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汉奸”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为例。林则徐在广东奉命查办鸦片走私时曾在《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中指出：“各国夷商来粤贸易，所有货船进埔，及夷商在省在澳，均准由洋商雇给买办工人应用，定例原所，不禁……乃有一种奸徒，不由商雇，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

[9] 这里的汉奸包含商人和一般群众，在林则徐看来，为谋私利，勾结外商，损害国家利益，为汉人之贼，所以称其为汉奸。至鸦片战争时期，在各路奏报、谕旨中“汉奸”二字比比皆是，汉奸之名被清政府官方所认可。此时汉奸多分布于闽、粤、浙、苏一带，作用多是“窥伺军情，造谣惑众”[10]或者做个安顺的“领路人”。当然，清政府过分夸大“汉奸”影响，甚至常常将“汉奸”作为战争失败的首因，难免有遮丑之嫌。

而后，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汉奸”最为猖獗的年代。其数量之多、波及之广、行径之恶劣达到了中国“汉奸现象”的峰值。抗战时期的“汉奸”数据搜集查询后如下：“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共抓捕汉奸嫌疑人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334人……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新成立的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件530多件，终结381件……根据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的报告，至1947年底，侦察起诉汉奸嫌疑人30828人……此外还有被通缉的数千人。”[11]另一组数据显示：“至1947年10月，全国法院审理汉奸情况为：检察方面办结63563案，起诉30185人；审判方面办结25155案，有14932人判刑……。”[12]“大致而言，伪省长处死刑，伪部长处无期徒刑……其他普通汉奸，刑期在2年6个月左右。”[13]《解放军报》中指出：“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14]至于中国共产党抓捕的汉奸数量，有一种说法是在44万左右，但由于没有官方宣布或者可靠的数字统计，该数据不具备可靠性。但是根据日本侵略者对于占领地区的统辖情况来看，实际的“汉奸”数量确实比较庞大。

纵观各时期“汉奸”形成之因，经分析归纳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①侵略者威逼利诱：民间疾苦，侵略者施以金钱物质或者危言恐吓，收买劳力；②商叛铤而走险：部分商贩由于生意亏损或者见利忘义，不惜风险出卖国家；③戴

罪之人投敌安身：犯罪之人为了躲避朝廷追捕，投敌他国以谋求生路；④与洋人熟识，帮忙获利：例如在清朝的海禁政策下，广东是唯一通商口岸，一部分洋人多年经商，结识不少沿海当地居民并趁机套取情报。

3 “汉奸现象”的文化成因及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对策

当外敌入侵，出现背叛国家利益的情况并不稀奇。这种“有奶就是娘”的卖国贼在各国都出现过，比如“韩奸”“德奸”“法奸”等。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数量如此众多的“汉奸”，乃至延伸到当代，在现今偶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汉奸现象”依旧在部分地区、部分新媒体平台上屡见不鲜！这不仅仅是多灾多难、人口基数大所能够完全解释的。文化是价值观的选择和表现，从文化层面分析“汉奸现象”才能追根溯源。笔者认为近现代“汉奸现象”源自中国传统家国文化中的弊端。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现代中国，现代思想启蒙随如当头一棒，但终究是蜻蜓点水，广大民众对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理念几乎为零。在此同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依旧坚持着专制独裁，加之国民教育得不到真正普及，民众剪掉的也仅仅是辫子，封建思想依旧顽固。伴随晚清万马齐喑的思想情形和腐朽垂死的政治机构，越发不堪的是社会普世的传统价值观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摒弃掉的思想糟粕。因此，如何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节入手，以教育改变思想、以思想更迭观念，正是当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背景之下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着重发力改革之处。

3.1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将历史教育与现实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我国的传统家国文化是以家为基础，配以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整体呈现出了封闭自守的态势。放眼到传统社会的表现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一统和大纷乱交替前行。家的概念以血缘为线可延伸至氏族乃至民族。民众的概念以地缘为线可延伸至部落和政权。历史长河中家族、民族的迁徙、融合已不用赘述。传统家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地理相结合就会导致民众忠于区域

性的氏族和部落，国家概念弱化，最终各自为政，地域分割。

放眼中国近现代，自辛亥革命后便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官方政府。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各自为王；北伐和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派别林立，争权夺利的国民政府内部将军队和土地视为家产，蒋介石在党内也无法调动全部力量和掌控全局。国家四分五裂，政府一盘散沙，使得整个抗战阵营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下降，时间一久，民众对政府就失去了信心。民众的地域观念浓厚，对于国家的认可度不够，向心力不足，没有国家的归属感。日本侵略者由此制订的“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计划开展得十分顺利。

因此，在当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应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将历史教育与现实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史为鉴，淡化“地域差异”，强调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将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育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客观地认识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充分认识到自己肩上的复兴重任，经世致用、学以强国。

3.2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进行理性引导

古今中外，爱国主义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绝不会过时。不可否认传统家国文化在保障社会稳定、稳固社会道德、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但家国文化中，国是一君之国，忠国即忠君，忠君即忠国。孟子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这是站立在君主立场为民发声，发展至明清已然被纲常伦理所抹杀。五千多年的家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体系伴随着独裁专制政治和封闭经济形态铸就了国人的奴性和劣根性。现代社会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左耳进右耳出”，在那个以农民和地主为主要阶级的时代，他们心中依旧对等级念念不忘，推倒了封建皇帝，竖起了资本皇帝，从来就没有真正民主过的国人依旧寄希望于“明君”的降临。当坚船利炮振聋发聩的时候，破碎的家国体系再也无法给百姓以庇佑，茫然无措，惶惶不可终日，投敌保身也就不足稀奇了。

而新时代的大学生是最有希望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物质条件充裕，生长在祖国风调雨顺的良好环境之下；他们感情丰富，但又极易冲动，盲目的爱国热

情促使他们极易受到鼓动,从而在非常时期做出许多不理智的自认为是“爱国”的冲动行为。因此,以史为鉴,对于当代大学耳濡目染受到爱国主义熏陶所产生的这种本能的爱国忠诚与热情,关键在于引导,在于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正确把握,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同时,使科学的理性能够驾驭这种年轻炽热的爱国情感。

3.3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突显国家性

爱国指的是热爱国家,先国后家。但是传统家国文化中恰恰相反。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5]背叛国家也就意味着对家、对自身的背叛,这其中蕴含着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自夏朝将部落文化发展为家国文化,周天子以家族血缘分封诸侯,立周礼,垂拱而治,中国就已经形成了民忠君,君忠天子,各司其职,各安礼法的惯例。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原始家国文化在时代的进步中被打碎。应运而生、脱胎于周礼的儒家礼法虽不受当时霸主青睐,但也体现出人们对于家国秩序重建的希冀。随着封建王朝建立,“家国”彻底沦为“王天下”的手段。

这种脱胎于家族血缘的家国文化中的国家性与家族性相比,国家显得十分弱势。在民间的日常表现就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路人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社会冷漠的表现背后蕴藏着对于家國中“重家轻国”的深刻内涵。正如老舍先生茶馆中一句经典台词:“我可是做了一辈子安顺良民。”人们面对国家危亡首先想到的是顺从安善,保全自己。淫浸在这种观念下的人已然不知何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面临国家存亡的时候自然轻易就失节了。

综上所述,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不仅需要强调民族精神、注重理想信念教育,还要有正确的荣辱观激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中国武汉市首当其冲,一夜之间“封城”“治病”,形势严峻。在治病救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关键时期,千千万万的“90后”医护人员、科研人员纷纷响应号召,冲上抗疫一线,以当代青年热血保我国泰民安。发生在非常时期的此情此景,

除了充分彰显我国体制优势之外,与国家正确的荣辱观激励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将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到高校大学生在校教育的全过程,使年青一代在关键时刻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精神,精忠报国,“无论生死,不计代价”,在爱国主义教育下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4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彰显民族性

国为民族民众之国,只有以民族民众为根基的爱国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当中建立了牢固的思想体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理念是极其强烈的,所谓:“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16]然而在这种观念中,国为君之国,君超脱于国。忠国就是忠君这一思想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近现代而未曾有大的改变。君若倾覆,国将不存。民众也就“树倒猢猻散”了。

随着天朝上国的梦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封建君主灭亡,民众处于无主的恐慌之中。无主后的接连失利更加剧了民心的涣散。毛泽东同志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分析道:“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17]抗战初期连续的大会战虽然阻拦了日本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18]。诸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曾是崇尚进步、追求民族自由的进步青年,然而在危急的民族情形下,他们对于日本的恐惧和谄媚,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让他们认为只有和日本合作才能生存下去,选择投敌叛国。这种叛逃究其根源就是国家信念中民族性的缺失,日本民族又如何肯、如何会、如何能救助中华民族呢?因民族性缺失所导致的“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令人唏嘘感叹。

延续到当代,这种民族性的缺失导致相当一部分高校大学生“精日”“哈韩”,盲目吹捧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也时刻在提醒着我们思政教育者加强“民族性”教育的重要性。新时代下,只有年青一代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也只有民族性才能让中国的年青一代在多变国际形势下具备最独特、最根本的竞争力。面对疫情、面对未来许许多多未知的挑战,只有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中充分彰显民族性,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兼具民族精神的新时代大学生,才能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当代青年精神充分结合起来,从实践角度真正做到将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培育鲜明的时代精神落实到“人”的身上,在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强大而独特的民族活力的同时,使新时代的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真正得以不断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重点项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SH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王伟光. 社科院院长: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联盟 想写啥就写啥[N]. 中国文明网.
http://www.wenming.cn/zxshkx_pd/201408/t20140826_2139849.shtml
- [2] Summerhill T. The Loyal Republic: Traitors, Slaves, and the Remaking of Citizenship in Civil War America [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20 (5). <https://doi.org/10.26643/hrj.v5i4.6873>
- [3] 郝亚明. 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5).
- [4] Filshtein T, Chan M, Mungas D et al.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of the Everyday Cognition (ECog) Scales in Relation to Racial/Ethnic Groups [J].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2020 (5).
<https://doi.org/10.1017/S1355617719001437>
- [5] 陈泽环. 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J]. 道德与文明, 2020 (3).
- [6] 贺金瑞, 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 [7] 李洋. 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看国际传播着力点——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

- 间海外輿情的分析[J]. 对外传播, 2020(2).
- [8]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 [9] 林则徐. 林则徐集·公牒[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0] 文庆. 筹办夷务始末(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1] 曹固强.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现象的思考[J]. 红广角, 2015(10).
[https://doi.org/10.1016/S0958-2118\(15\)30226-3](https://doi.org/10.1016/S0958-2118(15)30226-3)
- [12] 孟国祥, 程堂发.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J]. 民国档案, 1994(2).
- [13] 龚选舞. 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2.
- [14] 解放军报: 历史的拷问[N]. 2015-7-13.
- [15] 南怀瑾. 孟子与离娄[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16]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6.
- [17] 毛泽东. 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N].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2/2195016.html>
- [18] 刘新如. 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N]. 党建网.
http://www.wenming.cn/djw/jrrd/xwmt/201507/t20150714_2729820.shtml